

汤奇云 ◎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史论



中国现代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史论

汤奇云◎著

2007.12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IV. I506.6

出版发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西大街
邮编：510200 电话：(020) 82222332
<http://www.gdga.com.cn>
广州市新明光印刷有限公司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323千字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1-1000册
28.00元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史论/汤奇云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7 -5361 -3531 -4

I. 中… II. 汤… III. 浪漫主义 - 文学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9349 号

出版发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编: 510500 营销电话: (020) 87557232 http://www.gdgjs.com.cn
印 刷	广州市新明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 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323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序 一

沫姆：

你到深圳后确实很想念你，一直想着要给你写信，因忙碌，也时有不新有事打岔，就拖下来了，跟你通过电话后就心安了，可以不再写信了。序之我既答应过你，自然是要写的，想等你出版处所一交就立即动笔，目前还还没有着落，之处不必急着写了。你知道我的无能和懒惰，生出来是一团糟，一到深圳忙乱不堪，却又不知所措何事，如果问起来，只得字罗罗地说“无味事忙”了。近半年来，香港大学办了争取读三博士点，派人到“改委”，像你这个文已退休的人，也应按公暇，也得“不好字平”。文债背了一身，四月以前必须交卷的就有五篇之多。我索性把大作体排在前，一定把序文写好寄上，你工作不轻松，用违甚长，太委屈你了，我爱著稿为何！人生适合有情，“潜龙勿用”，只得耐心等待春雷。翘首南望，不胜依依！祝你

苏州铁道学院学报编辑部 (20×20=400)

谷融

谷融

3月23日

序 二

汤奇云毕业已经八年了，而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史论》也经历了八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得到了出版的机会。这自然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所有关爱和欣赏他的师友亲朋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在这段时间内，奇云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也引起了学界同仁的鼓励与关注；他的一些看法和见解，也曾引起学界的一些质疑和争议，得到过一些学者教授的指点和更正——这一切对于汤奇云的学术研究来说，无疑都具有一种激励和帮助作用，促使他的探索更加深入，思维更加细密，使这部专著更加充实，更具有学术价值。

学术是天下公器，其价值天下自有公论，只是时间或迟或早而已，无需曾经作为奇云博士生导师的我加以评判，况且我在这方面少有研究，没有资格和能力进行评判。奇云让我为其专著作序，无非是念旧情，不忘所谓“师恩”而已；而我之所以愿意写这个序，是因为奇云与我不仅仅是师生关系，更有久长醇厚的朋友之谊。尤其他在上海华东师大读博士期间，我们经常在一起散步聊天，自由自在地说东道西，不避深浅地谈论世事，甚至不拘礼数地饮酒颂诗，都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而奇云的通脱自然、重情尚义、真诚求学的精神品格，更是时时让我感动，不断给我力量，增强了我对于人、对于人性、对于人类社会的信心，使我能够笑对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难关，获得难得的人生欢愉的感觉。

当然，做这个课题，对于汤奇云来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这不仅在于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宽、范围广、头绪多，还在于浪漫主义在中国境遇的繁杂性，以及在这个研究领域至今还存在着种种成见与难点。比如，关于浪漫主义的源流问题，就至今还纠缠在中外古今的纷争之中。按比较宽泛的说法，浪漫主义古已有之，中国古代也不乏浪漫主义文学，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理出一条浪漫主义线索是合情合理的，由此又何以要提出“中国化”一说呢？因此，要论及“浪漫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首先就要理清中外浪漫主义发生、发展的不同源流及其理念——这本身恐怕就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但是，即便这样的话，那么鲁迅当年倡扬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精神，称之为“新力”、“新源”，就又成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见，梳理旧说不易，提出新见更难。不过，这些都没有难住奇云，确切地说，这些难题在奇云那里似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奇云当时选择浪漫主义这个课题，首先体现了他内心的一种求索的需求和冲动，蕴含着从内心发出来的真诚的向往与活力——这种向往与活力不仅来自于他的某种审美兴趣和爱好，更来自于一种根植于乡土和大自然中的真切的爱和激情；这也许是他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片土地与山水赋予的一种原始的生命欲望，具有冲破生活表象与文化禁忌束缚的鲜活的力量；其通过特殊的文化熏陶转化成了一种对于真理和创新的精神追求，通过呼唤和求真性情的艺术对话，渴望在广阔的艺术和学术空间获得共鸣。而正是由于这种活力、这种真诚、

这种向往，使奇云冲破了种种既定的观念的迷雾，直扑浪漫主义精神的生命内核，不仅在中外浪漫主义文学的碰撞和交流中有新的感悟和发现，找到了自己的路向，而且引发了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变迁的种种思考。就此而言，正像不能完全从学院化、规范化，甚至学理化角度去研读和研判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一样，我们也不能仅仅从概念和论说方面去评价奇云的论著，因为由此有可能错失了其中隐藏着的最可贵的生命气息和意味——而这正是使学术之树常青的最重要的因素。

学术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学术生命和意义是在不断行走中显示出来的。奇云在上海华东师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去了深圳大学任教，如今已经八年了。而令我更感到欣慰的不仅是他时常传来问候的信息，还有他表现出的对于人生、对于学术一以贯之的热诚和真诚。面对新的困惑和新的问题，他也一直不断地进行着新的探索和追寻。如今的奇云，人生体验和阅历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学养更加丰厚，正处于学术开拓和创新的黄金时代，我衷心希望奇云继往开来，永远保持生命的激情与活力，尽情、尽兴于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学术创造，有更多的收获和更大的快意。

是为序。

殷国明

2007年9月27日于华东师大一村

内 容 提 要

本书认为，浪漫主义的深层内涵是人的内在自然欲望的自在扩张。情感的冲动，想象的燃烧，只是欲望的外在表现形式。欲望，除了指个性意义上的感性需求，还扩展到对近代人文精神乃至现代人本主义的文化渴望，如自由、科学、美等。浪漫主义是欲望的文学旗帜。

本书除绪论与结论外，共13章，30多万字。

在绪论中，主要回顾了20世纪前50年我国理论界对浪漫主义的引进与研究状况，引出了目前浪漫主义研究中出现的两大弊端：一是理念的先验性，以所谓西方“原汁原味”的浪漫主义理念来比照、言说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从而形成了一种否定中国浪漫主义存在的理论倾向，既没有形成像勃兰兑斯式的对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的“本土式”的言说，没有真正摆脱西方文学霸权话语的阴影，形成自己的浪漫主义理论体系，也没有完成对现代中国浪漫主义的整体把握；二是以一种“意图伦理”的姿态，机械地认定浪漫主义是在从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冲突中建立起来的文学理念，主观而片面地确认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内涵，使浪漫主义概念越来越混乱而空泛，甚至已经停止履行一个词语符号的功能。

第一章，批评了以“阶级立场”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立场对浪漫主义这种人类精神现象进行机械地切分的认识状况，并认为只有坚持浪漫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的认识，回到澄明的存在，才能使浪漫主义自在而完整地呈现出来。

第二章，对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文化起源及其在欧洲各国（主要是德国、法国、英国）的演变和理论个性进行溯源。

第三章，回顾了我国五四前后对浪漫主义的接受状况和对中国知识界精神空间的拓展。

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情感类型及其美学意义、理性构架，以及情与理之间既冲突又依从的辩证关系，作出了具体的分析。

第七章，从浪漫主义艺术的四维（白话文、自然、独创与因陈，以及直觉思维方式四个方面），阐述了五四新文学的浪漫个性。

第八章，从“功利的无功利”艺术，到“文学无用论”，到“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衍进过程，看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文学意义的生成。

第九章，考察了中国现代第一个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创造社，接受浪漫主义的历史姻缘，以及创造社成员之间的浪漫歧义。

第十章，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以及自由主义文学理论中所呈现的浪漫主义变异，揭示了浪漫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沉静的

浪漫。

第十一章，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战争文学中浪漫观念的几种典型的表现形态。

第十二章，分析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合法性与崇高性的失落与回归的历史因由。

第十三章，揭示了现代浪漫主义在文学话语世界里沉浮（“正名”与“无名”）的生存状况，并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以艺术为本位”的文学姿态。

在结论中，通过考察，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作出理论总结。



目 录

绪论	(1)
一、问题的引出：浪漫主义的研究状况	(1)
二、问题的难点：关于浪漫主义的存在与言说	(9)
三、跨越“门槛”：回到“人的文学”	(13)
第一章 对以往研究状态及其方法论的反思	(17)
一、精神现象机械式分类的荒谬性	(17)
二、“阶级立场”的介入所带来的认识后果	(20)
三、回到澄明的存在：考察浪漫主义的基本立足点	(24)
第二章 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观的文化起源及其演变	(27)
一、浪漫主义的迷雾	(27)
二、浪漫主义的文化起源	(30)
三、“正宗”的德国浪漫主义	(34)
四、古典式的法国浪漫主义	(38)
五、不自觉的英国浪漫主义	(39)
六、浪漫主义的美学意义	(43)
第三章 五四前后对浪漫主义的接受空间	(45)
一、翻译中的民族主义姿态	(45)
二、浅层次的“浪漫”与“启蒙”	(48)
三、精神空间的拓展与新美学的生成	(52)
第四章 个人主义：浪漫主义的理论核心	(55)
一、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意义及其发生过程	(55)
二、“新人”：浪漫主义进入中国的契机	(57)
三、“新我”：现代个人主义的中国意义	(58)
第五章 情与理：浪漫主义的辩证法	(64)
一、科学理性：照亮了现代人的情感世界	(64)
二、艺术理性：从古典“情结”到现代象征	(67)
三、冲突与依存：浪漫主义与工具理性和现实理性	(72)
第六章 感伤与激愤：浪漫主义的两种情调	(78)
一、情感在艺术层面的理论自觉	(79)
二、浪漫主义的情绪类型	(82)

三、愤激社会情绪的来源·····	(85)
四、感伤个体情绪的产生·····	(88)
五、对浪漫主义情绪世界的美学分析·····	(92)
六、颓废主义：浪漫主义的变异·····	(96)
第七章 现代浪漫艺术之维 ·····	(101)
一、白话文：不自觉的浪漫之手·····	(102)
二、“自然”：浪漫主义的艺术境界·····	(104)
三、独创与因陈：新文学的浪漫限度·····	(107)
四、直觉：浪漫艺术的一种思维方式·····	(112)
第八章 浪漫主义观的生成与意义 ·····	(114)
一、走向浪漫：功利的非功利艺术·····	(114)
二、浪漫的开始：文学无用论·····	(117)
三、从“文学无用论”到“为艺术而艺术”·····	(120)
四、对“为艺术而艺术”文学意义的重新评价·····	(122)
第九章 创造社浪漫观的歧义 ·····	(126)
一、话语权的争夺：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语丝社之争·····	(126)
二、个人趣味与翻译在创造社浪漫主义观形成中的作用·····	(130)
三、郭沫若：转向的“凤凰”·····	(133)
四、郁达夫：孤独·颓废·唯美·····	(136)
五、成仿吾：“中国的圣佩韦”·····	(139)
六、张资平：“变味的浪漫”·····	(143)
第十章 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 ·····	(146)
一、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赓续·····	(147)
二、梁实秋与新月派：“披着古典主义之皮”的浪漫主义者·····	(149)
三、京派文艺：陶渊明式“沉静”的浪漫·····	(152)
第十一章 20世纪40年代战争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形态 ·····	(162)
一、战争中欲望的转换·····	(162)
二、“七月”的英雄激情·····	(164)
三、“战国策”派：为消弥战争恐惧的“虔恰”浪漫·····	(168)
四、郭沫若与田汉的戏剧：“自我英雄化”的浪漫·····	(172)
五、徐訏和无名氏的小说：书写“梦想”与“空灵”的浪漫传奇·····	(176)
第十二章 浪漫主义“崇高”的失落与回归 ·····	(182)
一、浪漫主义与科技主义·····	(182)
二、“疑案”的自造·····	(185)
三、无产阶级革命与浪漫主义·····	(186)
四、崇高：不单纯是一个美学概念·····	(188)

五、现代性批判：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者的梦想	(190)	目
第十三章 浪漫的沉浮	(195)	录
一、浪漫：一种基本的艺术态度	(195)	
二、悖论：对浪漫的批判与渴望	(196)	
三、无名：浪漫主义的又一种存在状态	(199)	
四、隐逸文化：宁静浪漫主义之根	(200)	
结论：关于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观	(204)	
参考文献	(208)	
后记	(210)	

绪 论

一、问题的引出：浪漫主义的研究状况

浪漫主义在文学领域里的表现形态和产生过程，在中西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西方浪漫主义最初表现为一种与经基督教文化所浸染的、贵族化的、刻板的生活方式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主张在私人日记中自在而大胆地袒露个人隐私与内心的秘密。在19世纪，浪漫主义终于浮出了文学的地表，由于其平民化和自由化倾向，在反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在文学领域的代表——古典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发展为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学潮流。其后，又在德国歌德、席勒和施莱格尔兄弟的理论总结下，形成了对浪漫主义的初步的理论构架。

然而，我国的现代浪漫主义的生成过程，基本上是理论先于创作的，是在浪漫主义理念输入以后才有其相应的文学实践活动的。中国古代浪漫主义也是在现代浪漫主义观念形成以后的一种理论认同与追溯的结果。因此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研究基本上呈现出五种形态：浪漫主义理念输入；与现实主义冲突过程中对浪漫主义创作的理论总结；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与改造；对浪漫主义作家与流派的研究；浪漫主义思潮研究。

最初的浪漫主义理念输入阶段，应该是浪漫主义的启蒙阶段。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就介绍说，外国小说有“理想派”和“现实派”之分。“理想派”就是浪漫派。在梁启超的观念中，浪漫是远离现实的理想，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文学形态。

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和赞颂了尼采、拜伦、裴多菲、莎士比亚、普希金、莱蒙托夫、勃兰兑斯、密茨凯维支等一大批“摩罗”诗人。“摩罗”就是魔鬼，是基督教里与现成秩序的维护者上帝作对的“撒旦”。恰巧基督教就曾把浪漫派称为“恶魔派”。因此鲁迅所期待的“摩罗诗人”就是欧洲浪漫主义式的诗人。鲁迅认为，“摩罗诗人”要有三方面的素质：一是反抗流俗，立己抗群，富有以自由为宗旨的反叛精神。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二是要有尼采的“超人”精神，自尊自强，“刚健不挠”，“贵力尚强，尊己而好战”，“不克厥敌，战则不止”。三是“抱诚守真”，“卧天然之怀，作婴儿之笑”；不恶“野蛮”中的“新力”。^①

如果说梁启超的“理想派”浪漫观，尚处于一种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外在形态的认识，而鲁迅已经深入到了对浪漫主义的内在精神的探讨，具有极强的反旧道德、旧文明

^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转引自罗湘、陈隽编，《鲁迅全集》，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

的性质。“摩罗诗人”观的确立，为鲁迅日后完成对国民性的批判设立了赖以对照的标准。

1918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的观念，以呼应1917年陈独秀在《革命文学论》中提出的打倒“贵族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口号，为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在中国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浪漫主义的最初理论形态，是企图确立一种与“传统人”或“旧人”相区别的新人学思想在文学领域里的表现。

1920年是浪漫主义的大介绍年。“学衡派”的胡先骕和吴宓在介绍欧美文学的发展趋势时，反对写实派，认为现实主义偏重揭露黑暗，但缺乏审美价值，因而主张浪漫主义。宋春舫、沈雁冰、陈望道等人也撰文或译述介绍外国浪漫主义文学。宋春舫还在《近代浪漫派戏剧之沿革》^①中说到，19世纪的欧美浪漫主义戏剧，反对复古，“其精神在于摒弃‘习惯’，扫除不合时宜的制度，颇有‘破坏偶像’之气概”；认为浪漫主义倾向革命，常成为反抗者的代名词。应该说，到此时学术界才开始对西方浪漫主义进行全面的理论接触，“学衡派”重其在艺术上独特的美学价值，而沈雁冰、宋春舫和陈望道等人则侧重于其文本意蕴对现实的反叛性、批判性和革命性。

梁启超和“学衡派”虽然看到了现实派和浪漫派之间在美学上的内在冲突的紧张性，并有一种偏重浪漫主义的倾向，为后来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的“人生派”与“艺术派”之争埋下了伏笔，但沈雁冰等人还没有感受到这种冲突。沈雁冰一边翻译和介绍着浪漫主义文学，一边又在反驳吴宓对西方写实派的贬斥与攻击。因为沈雁冰看到的是，在精神上浪漫主义的反叛性与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有着内在的统一，两者并不相悖。

1923年，《创造季刊》1卷4期上，刊有郭沫若、徐祖正等人的文章，大力宣传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认为浪漫主义的特征在于反抗文学的旧内容、旧形式，乃至反抗不合理的保守的旧社会。他们把浪漫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主要对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进行理解、吸收，并化为自己的文学经验。此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还结合自己的创作，系统地论述过他们对艺术的浪漫主义的理解，如认为“艺术是自我的表现”，“不是再现”；崇尚灵感与天才；认为艺术品由“纯粹的主观产出”；诗人要把小我推广为大我，把艺术与革命结合起来；生命的文学是个性的文学等。^②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论由此而初步走向成形。

1924年，人们举行了拜伦的百年祭，长期与创造社“打架”（成仿吾语）的文学研究会在《小说月报》上出了“拜伦专号”。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等现实主义者，也在借拜伦大力宣扬浪漫主义对自由的向往和他们反抗旧世界的无限热情。这说明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间在理论上的冲突，仅仅是艺术观中创作论之间的冲突，而在文学本体论上并无矛盾之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两个相交的概念，浪漫主义虽然以“唯美主义”的形式出现，但同样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这种兼容性，直到1933年周起应（周扬）依据苏联学者的文

^① 《东方杂志》，1920年17卷第4号。

^② 钱中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载《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5期。

章编写出《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才在理论上得到解决。他说，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相对立，前者可被后者所包容，因为要写本质，要写典型，就离不开革命的浪漫主义。在抗战期间，他还提出过“抗日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

但在周扬眼里，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一样都得到了改造。早期的浪漫主义本来就具有革命性，但“革”的是旧文学、旧文化、旧道德乃至传统社会秩序的“命”。而此时加在浪漫主义头上的“革命”，是指“无产阶级革命”。浪漫主义被融注了浓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浪漫主义被意识形态之刀切割成两半：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这当然有高尔基的理论启发）。积极浪漫主义就包含着革命的浪漫主义。

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作为文学评论家的茅盾。茅盾不仅曾是浪漫主义的倡导者，也是一个对浪漫主义卓有建树的研究者。1920年至1922年，他在《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十九世纪丹麦大文豪约柯柏生》、《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书后》和《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等一系列论文中认为：“中国实在连真正的浪漫文学都不曾有，一向躅于好古主义的下面，浪漫精神缺乏得很。”^①并以进化论的观点发现，欧洲文学走过了“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的过程。“新浪漫”是“浪漫”的复活，以柏格森、倭铿、詹美士的“人格唯心论”^②为哲学基底，反映了现代人的新理想、新信仰。茅盾所指的新浪漫实际上是西方后期反科技理性对人的异化的浪漫主义，他认为这是我们新文学作家努力的方向，但必须是在大力发展了写实主义文学之后。1956年，他还写下了《关于艺术流派的笔记》，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观点，从哲学到美学对浪漫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阐述了欧美各国浪漫主义的个性特征。但此时的茅盾由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基本上是褒现实主义贬浪漫主义的。与周扬一样，也希望通过对浪漫主义进行改造而批判地予以吸收。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还存在着另外两种对浪漫主义的研究思路。

一种是以梁实秋和张竞生为代表的对五四新文学的浪漫主义特征的批判。他们通过五四新文学与欧美浪漫主义文学的对比，都认为五四新文学有着浪漫主义的特征。

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一文中，站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保守立场上，坚决反对这种浪漫主义趋势。他从新文学运动是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推崇情感而轻视理性、对人生采取印象主义态度和皈依自然并侧重独创四个方面，认为“现今中国文学”在艺术上是浪漫主义的。但他说：“我们赞成‘皈依自然’，但我们是说以人性为中心的自然，不是浪漫主义者所谓的自然。浪漫主义者所谓的自然，是与艺术立于相反的地位。我们也可以赞成独创，但我们是说在理性指导下独创，不是浪漫主义者所谓叛离人性中心的个性活动。”^③如果有“自然人”与“社会人”之分，那么“社会人”的道德人性论是其批判现代浪漫主义的武器，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文学批评的立足点。白璧德的“情理制衡”理论是他不变的人性观信条。

张竞生也写作过《伟大与怪恶的艺术》一书和《浪漫派概论》等长文，图文并茂地

①② 茅盾：《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载《改造》，1920年第9期。

③ 《梁实秋作品集》，27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

介绍了欧美浪漫主义的“直感”思维、历史及其艺术特征（如伟大而怪恶的人物与文字，对自然的欣赏等）。他也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新文学的倾向完全采取浪漫主义。”但他认为新文学的浪漫色彩还不浓，势力还不小，不敢追求“伟大的怪恶”；不敢创造新字句、新意义；抱守本国艺术思维的单调与平庸；个性色彩缺乏，不敢恩怨分明，乃至不能做到爱到极点与恨到极点；连死板的象形文字也不敢打倒。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在几千年古典主义的困顿与约束下，新文学作者在思想上对浪漫主义的自由精神认识不清；在行动上不敢向政治争自由，甚至一己一家的事情也不能改革。

应该说，梁实秋和张竞生这一反一正的批评，既为我们介绍了欧美浪漫主义思想和艺术，也为我们描绘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在五四新文学中的状态与特征：有浪漫，但是是一种有限的浪漫。无论是从艺术层面还是从思想层面来考察，尚不足以构成与19世纪欧美浪漫主义相媲美的文学潮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一种从生存论的角度来研究浪漫主义的学术行为，如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苏汶和京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在文章中没有提到浪漫主义，而是在维护文艺的自由，或是在研究文艺美学时涉及，但此时的“文学”或者“美学”已不再是一门单纯的学问，“而是身临现代型社会困境时的一种生存论态度”。^① 艺术家或美学家在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明显地更多关注着个人感性生存的可能性。正如德国美学家倭铿（R. Eucken）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性质的总结：“现在，美变成了生活发展的主要工具，变成表现人的各种力量的自我意识和自身享受的最重要的方式。艺术教导生活去发掘生活本身，去达到生活的最高境界。同时，生活反对一切不真实的无形束缚；明显地忠于直接真实，热望通过对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支配去实现完全和无限的幸福。生活充满强烈的愿望和骄傲的自我意识，很容易使人把道德看成无故强加的限制，僵硬的训令和讨厌的束缚；个性越坚强，抛弃所有的束缚遵从自己天性就显得理直气壮。”^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自由主义”文人，虽然也像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一样感觉到“道德”对生活的挤压，但此时他们更深切感到强大的政治意志对个人写作活动的压迫，而感到缺乏个人的精神空间。对个人精神空间的维护就演变为一种浪漫主义行为。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里就明确提出，“感情主义”、“个人主义”、“任何理想化”都属于“浪漫蒂克倾向”，是无产阶级所不需要的。创造社成员也从唯物辩证法原理出发，认为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倾向有违“集体主义意识”，是“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自我的浪漫表现”（祝铭：《无产阶级文艺底特质》），“浪漫主义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③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则把“必须将那些‘身边琐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式的‘革命兴奋和幻灭’、‘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等等定型的观念的虚伪的题材抽去”写进了决议，对“革命罗曼蒂克”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与清算”。

① 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前言》，1页，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4。

② 倭铿：《道德与艺术——生活的道德观与审美观》，转引自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正如、诗人论美文选》，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4。

③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载《创造月刊》，1926年第3期。

浪漫主义原本给生活以更多的自由与欢乐，给文学以更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的承诺，却遭到了以社会责任感的名义出现的政治功利主义的挑战。此时的浪漫主义便表现为一种与政治功利主义文艺思想相对抗的挣扎式生存，并呈现为多元理论形态。

“自由人”胡秋原歇斯底里地呼喊：“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他反对“极端反动主义者”——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与“急进的社会主义者”——左翼文坛对于文艺的“侵略”。^① 苏汶则宣称要做“第三种人”。

朱光潜在《谈美·“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谈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和《看戏与演戏》等文章中，一再申说艺术的超功利性和独立性，绝不能容忍文艺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翼，并从美学的高度提出了“距离说”，认为“艺术和实际人生”应保持一定的距离；艺术家应该采取旁观者的“看戏”的态度审美地“观照”世界，而“不介入”政治斗争特别是党派斗争。

宗白华在《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中提出过“静观说”^②；梁宗岱在《谈诗》中也提出过“纯诗”理论。^③ 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刘西渭在《咀华集》中主张“印象的批评”与“宽容”的态度，认为批评家“属于社会，然而独立”，他应该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批评最大的挣扎是公平的追求”。^④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重提明代公安派的“性灵说”；沈从文在《沫沫集》、梁实秋在《偏见集》中，都提出过文学的“人性论”思想。虽然他们对“人性”的内涵理解不一，但都主张文艺远离政治功利，要求以人的本能要求与淳朴、原始的欲望作为文学的基本内容与美感基础。

应该说，这种立足于思想上的“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艺术上的“唯美主义”的文艺批评潮流，达到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研究的最高理论水准，基本形成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理论构架，尽管没有把他们的理论进行浪漫主义的命名。

由此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研究不能简单地说是关于文艺美学问题的探讨，其深层却是一个关于个体感性生存问题的探讨。在与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工具论文艺思想）的生存搏斗中，汲取了古今中外的艺术资源（包括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西方现代派特别是象征主义的美学思想），确立了自身艺术合理性的存在。说它们合理，是因为它们旁征博引，言之成理，但它们仍然不合法，因为“法”是权力意志的表征，是对权力意志的利益的维护，是否“合法”需要通过权力意志的确认。

在20世纪的中国，如果说30年代以前，浪漫主义仅仅是遭到了人们的怀疑与追问，如创造社对自身浪漫派身份的避讳，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批评和“左翼文坛”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那么30年代以后，浪漫主义无论是文艺思想还是文艺创作，从来就没有真正得到过合法性的认可，一个显而易见的佐证便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批判。因此，胡风文艺思想及其批判就构成了这一段历史时期对浪漫主义研究的重要组

① 胡秋原：《阿狗文艺论》，载《文化评论》，1931年创刊号。

②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2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③ 梁宗岱：《谈诗》，转引自《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④ 刘西渭：《咀华集·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成部分。

虽然1933年周扬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中，政策性地给予过浪漫主义一个合法的身份；抗战期间还提出过“抗日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等口号，但此“浪漫”已不是彼“浪漫”，浪漫主义已经遭到了政治意志的“阉割”与改造，沦为了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工具论文艺思想。这一点从1935年周扬发表的《高尔基的浪漫主义》一文中就可以看出来。浪漫主义概念里已被填塞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民族英雄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等内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涉及新诗的发展方向时，提出过“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后来发展成“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的指导性创作方法，浪漫主义的内涵也只局限在要有理想、要敢说敢想这一点上。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真正获得了合法性地位，而且从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来看，这种经改造了的浪漫主义精神也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与落实。

20世纪40年代初，随着国内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尖锐，组织原则越来越显得十分重要，这种组织原则也逐渐从军事斗争中扩张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等精神生活当中。高度组织化的直接后果是作家和艺术家的私人精神空间的丧失，个人的主体性沦落，形成了创作上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客观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冯雪峰1946年撰写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文中得到了揭露；在文艺思潮上则出现了浪漫主义的失语症。浪漫主义只能寄寓在现实主义的屋檐下，并伪装成现实主义话语方式而出现。

20世纪40年代初，胡风就在一系列的批评文字中明确指出，在文艺创作中作家缺乏“主观战斗力量”和“战斗意志的燃烧”，要求作家发挥自我的“人格力量”，与群众身上“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创伤”进行搏斗，后来发展成“主观战斗精神”理论。1948年，他又撰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1951年出版），要求文艺“要体现人民的负担、觉醒、潜力、愿望和夺取生路这个火热而坚强的主观的思想要求”；也要求作家“凭着他的战斗要求突进客观对象，和客观对象经过相生相克的搏斗，体验到客观对象的活的本质”，^①从而把客观对象变成自己的东西表现出来。总之，他既强调表现对象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更强调表现者作家的主体性，并认为这才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

实际上，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与20世纪80年代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如出一辙，都是一种浪漫主义文艺思想，都带有欧洲浪漫主义的那种强调人之为人的自然本能与欲望的反抗能量，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现有文明与文化对人的奴役与异化的性质。

一直与胡风在理论上相呼应的冯雪峰，在1952年发表的《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等一系列论文中，还在躲躲闪闪地为自己的浪漫主义身份作辩护。他说：“三千年来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大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但离不开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是它们的特征之一。”

因此，周扬、何其芳和黄药眠等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就完成了继文学研究会和左翼文坛之后的对浪漫主义的第三次批判性研究。如果文学研究会对创造社的批评还只

^①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39页、42页、45页、48页，上海，泥土社，1951。